

【中东研究】

论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

——《中东国家通史·塞浦路斯》编后记

彭树智

(西北大学 中东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站在人类文明交往论角度,具体论述了中东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企图从时间、空间、人际相处这三个文明交往的基本条件上,分析了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缺乏塞浦路斯国家观念,并指出希腊族更多的是欧洲属性,而土耳其族更多的是土耳其属性,正是这些因素,使两种文明难以融合起来,这些是成为当今塞浦路斯民族和宗教冲突的深层因素。

关键词:塞浦路斯;希腊;土耳其

中图分类号:K37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731(2004)06-0005-07

民族与宗教交往问题,历来是中东文明交往史上的最核心内容。民族与宗教矛盾是当代中东地区动荡不宁的主要内在原因。当代中东的民族与宗教矛盾之所以表现得特别突出和持久,还在于它是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焦点和各种文明交往的聚散地区。

中东民族与宗教矛盾的复杂性,从内部交往而言,主要表现为五大民族和三大宗教的错综交织。阿拉伯民族、土耳其民族、波斯民族、库尔德民族这四大民族,都信奉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不但教派林立,库尔德族也毗连伊拉克、伊朗、土耳其和叙利亚,并兼有社会和国际因素。信仰犹太教的犹太民族在人数上虽不是大民族,但它建立的以色列国却使之成为强势民族。塞浦路斯的希腊族和埃及的科普特族也称不上大民族,然而这两个信仰基督教的民族,在所在国处于重要地位,尤其是前者,在塞浦路斯堪称举足轻重。

中东民族与宗教之间的矛盾激化为冲突的,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第一,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之间的交往类型。这一类型交往有的成为中东问题核心,如阿拉伯民族与以色列的犹太民族之间的长期

冲突;有的成为久悬不决的问题,如塞浦路斯的希腊民族与土耳其民族之间的争执。第二类型是不同民族的同一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类型。这一类型的最突出和有影响的事件,是产生在巴勒斯坦问题之前的库尔德民族和阿拉伯、土耳其、波斯民族之间的广泛而持久的争端;还有阿拉伯民族和波斯民族之间的纠纷,以至于发生了伊拉克和伊朗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第三类型是同一民族同一宗教信仰之间的交往类型。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多次纷争与和解,都属于这一类型。

中东的民族与宗教交往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矛盾和冲突,有历史上形成的积淀因素,其中不乏交往活动中诸多负面遗留。但最重要的和最直接的外部因素是西方殖民体系统治的“分而治之”政策所造成的恶果。这种殖民政策或加深、或引发、或制造了民族和宗教之间的矛盾,成为西方列强维持中东霸权的手段。

20世纪50~60年代,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在西方殖民体系崩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这本是中东走向复兴和发展的大好时机,不幸的是,曾经在

收稿日期:2004-06-23

作者简介:彭树智(1931-),男,陕西泾阳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东南亚史教学与研究。

立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中起了前导和推动作用的民族主义,独立以后,却向大民族主义、狭隘民族主义、地区霸权主义的方向发展。这种非理性的极端性,也在教派之间蔓延,并且和民族冲突相结合,表现为宗教价值系统的强烈政治归属感。本民族利益至上的利己和排他性,民族和宗教负面作用的情绪化、盲动性、狂热性,被政治集团或大国干涉行动所利用,导致问题的复杂化、国际化。新建立起来的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由于内外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特别是在全球化的大环境下,它成为一个不稳定的、政局经常变动的脆弱体系。塞浦路斯作为这个体系中的一员,表现了民族独立国家在民族与宗教交往中的共同点和独特性。

塞浦路斯问题必须从上述大背景下观察,才能寻找到它的位置。它的特点是历史性、国际性和长期性。它的根本而内在的悲剧在于因缺乏塞浦路斯国籍认同而演化为民族主义的极端性。深入探讨塞浦路斯的民族和宗教交往问题,不能不从时间、空间和人间这三个文明交往的基本条件上,去察究其联系和变化。

二

时间,是人类文明交往的经线。塞浦路斯的民族和宗教交往,首先运行在这条历史轨迹的经线上。

从时间段上,民族和宗教交往可分为四个大的时期。

第一时期:希腊基督教文明与早期东西方文明之间的交往时期。这是塞浦路斯历史长时段中最复杂、最缓慢、最远程的时期。

早期塞浦路斯的历史是一部移民文化史,而真正使塞浦路斯发生历史性变化的,是公元前2千纪开始的希腊人的多次移民浪潮。这种移民如此强劲,它同化了古塞浦路斯人,它用希腊语取代的塞浦路斯-米洛斯语,它把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带入了塞浦路斯,以至形成了持续两个多世纪的“后迈锡尼文化”。

塞浦路斯从公元前6千纪最早居民聚落开始,中间经历了许多发展阶段。这个漫长时期终点是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希腊文明与腓尼基文明、亚述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法兰克文明、犹太文明、威尼斯文明的各种形式和频繁的交往中,既形成了塞浦路斯的希腊人基本民族群体,也确立了希腊文明的主体地位。

希腊人在塞浦路斯岛上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外

来民族的入侵、征服和统治。在奥斯曼帝国征服以前,对塞浦路斯的希腊人有最重要影响的是罗马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统治阶段。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的东征、托勒密王朝的统治,特别是罗马帝国对塞浦路斯近400年的统治,以及后来融汇希腊、罗马文化的拜占廷帝国的统治,加强了塞浦路斯希腊人对本民族与文化的认同。希腊化和基督教化的浪潮,席卷塞浦路斯。公元448年、629年,塞浦路斯正教会两度被确立为独立地位,1448年,该教会脱离安提阿教会牧首管辖而宣布自主,这些都是本时期塞浦路斯民族和宗教交往最重要发展阶段的标志性事件。后来希腊族人的塞浦路斯正教会,发展成为中东地区最大的正教会,由大主教统领岛上的6个教区,对塞浦路斯社会生活起着重要的作用。

第二时期:希腊基督教文明与土耳其-伊斯兰文明之间的交往时期。这是1571-1878年奥斯曼帝国对塞浦路斯的统治时期,也是塞浦路斯历史上除了希腊民族之外,外来民族和宗教交往带来影响最为深远的时期。在东地中海的塞浦路斯岛上,增添了新的族群——信仰伊斯兰教的土耳其人。

奥斯曼帝国统治之初,便把塞浦路斯作为它南部领土的一部分,同安纳托利亚南部的阿拉雅等四州组成一个总督区,目的是为了维护帝国霸权的海上联系通道的安全。为了同一目的,奥斯曼帝国采取留驻官兵人员和迁徙安纳托利亚中、南部移民等方式,并且以免税3年等优惠条件,先后促使4万多贫苦的土耳其农民和手工业者移居塞浦路斯。土耳其人逐渐成为仅次于希腊人的塞浦路斯第二位居民群。他们带来了与希腊族人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且同北邻土耳其本土保持着密切联系。

希腊人和土耳其人这两个同居一岛的不同民族、不同信仰族群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具有以下主要特征:

1. 土耳其人作为统治民族,对被统治的希腊族人最初采取了宽容的民族和宗教政策,承认并且赋予正教会的岛内行政、文化自治权和大主教的教民首领的特权,而且把拉丁人统治者剥夺的土地,归还给希腊族人。

2. 在奥斯曼帝国统治初期,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人之间不但平安相处,而且一段时间中,彼此接触较多而且变得友好起来。有资料说明,有些希腊族基督教徒皈依伊斯兰教,他们的穿着一如土耳其人,有的甚至还同穆斯林妇女结婚。

3. 但是好景不长,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在塞浦路斯的上述情况只是昙花一现。这个时期两个民族和宗教交往, 最重要的特征, 是各自固守本民族和宗教生活习俗, 彼此缺乏作为共居塞浦路斯人的思想情感交流和国家认同感。历史研究者曾统计过, 1862年, 全岛共有 605 个村镇, 其中基督教徒村镇 248 个, 穆斯林村镇 118 个, 两族共居村镇 239 个。民族、宗教之间的隔绝封闭达到这种程度, 以至于同居一村, 也很少往来。这种缺乏情感交流、经济交往、文化沟通的状况, 难以在心理上形成对塞浦路斯国籍的认同感, 为以后历史、特别是为建国以后长期的民族与宗教冲突, 埋下了祸根。

4.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各自背靠自己的母国, 不但在宗教文化上, 而且在政治归属上形成了相互对立的发展趋势。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对希腊族基督徒的迫害, 加上 1830 年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统治而获得独立之后, 奥斯曼帝国 1831 年承认了塞浦路斯基教徒加入希腊国籍的权利, 使这种趋势更加明显起来。在此期间, 有些教士鼓吹塞浦路斯并入希腊的思想, 开始了后来“意诺西斯”(塞浦路斯同希腊合并运动) 的先河。

总的说来, 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 除了 1821 年“迫害时期”对希腊族在大主教、主教、修道院院长数百人的大屠杀之外,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民族和宗教矛盾还不尖锐。但有一点值得注意, 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都没有从共同地域生活中产生塞浦路斯国家意识。

第三时期: 塞浦路斯希腊族、土耳其族与英国殖民统治者之间的交往。

1878- 1960 年英国对塞浦路斯长达 82 年的统治时期, 是英国的西方强势文明对弱势的希腊族、土耳其族弱势文明之间的复杂交往时期, 也是希腊、土耳其两国深深介入和国际关系大变动的时期。这个承上启下的文明交往的关键时期, 孕育了日后塞浦路斯问题许多直接或间接的缘由。土耳其族成为失去统治地位的民族。希腊族虽和英国同属西方基督教文明, 但在政治地位上仍处于被统治处境。英国文明带给塞浦路斯的, 是昔日罗马帝国的“分而治之”的统治政策, 以及与此政策相联系的西方民主的政治形式——立法委员会。这一切做法的根本目的, 是维护英帝国在中东的霸权地位, 把塞浦路斯变成“东地中海的不沉的航空母舰”。

这是一个变化迅速、剧烈而复杂的时期, 具有以下主要特点:

1. 在塞浦路斯未成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以前, 素以老奸巨猾著称的英帝国, 在希腊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玩弄“借土安希”的推拖拉拢手段。特别是对待当时方兴未艾的塞浦路斯希腊族的同希腊合并的“意诺西斯”运动, 采取的转嫁手段, 把矛盾推到奥斯曼帝国具有“宗主权”问题上。这样, 既取得希腊族人谅解, 又缓和土耳其族人不满意, 还为蚕食奥斯曼帝国领土和吞并塞浦路斯创造条件, 可谓一箭三雕。

2. 英国统治者利用处于少数地位的土耳其族人的依附情绪, 实施平衡和对抗约占居民 4/5 希腊族人的策略。开始时曾拟将俄土战争中逃到土耳其难民中的 1 万人迁至塞浦路斯, 以增加土耳其族的人口比例。此计不成后, 又搬出西方英国式的殖民地型政治文化的立法会议, 用土耳其族 3 名成员, 加上官方代表 6 名成员, 以对抗 9 名希腊族成员。当然这是以人口调查比例为口实, 迫使土耳其族就范的“分而治之”政策。

3. 1923 年塞浦路斯沦为英国直辖殖民地以后, 软硬兼施的英国殖民统治者, 把“分而治之”的传统政策推向高峰: 一方面实行镇压, 另一方面又宣布各种半自治宪法方案, 甚至声言要投资 3800 万英镑来发展塞浦路斯经济。英国殖民统治者进一步利用土耳其族对“同希腊合并”运动的恐惧心理, 把原先反对由土耳其和希腊瓜分塞浦路斯的主张, 改说成“瓜分可能是惟一的解决方法”(总督哈丁 1957 年 7 月语), 并且把瓜分的思路作为以后各种解决塞浦路斯问题的出路之一。

4. 随着希腊和土耳其在塞浦路斯矛盾的激化, 随着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人之间流血冲突的扩大, 随着美国和北约盟国的干预, 英国在塞浦路斯失去了主导权。在 1958 年塞浦路斯问题国际化高潮中, 英国以保留两个主权军事基地的条件, “为了留下而走”地退出了塞浦路斯。希腊族领袖马卡里奥斯放弃了与希腊合并的主张, 而提出由联合国来解决塞浦路斯独立建国问题。历史面临着转机。

第四时期: 塞浦路斯希腊族与土耳其族围绕国家问题的交往。这是塞浦路斯最近时间段的历史, 是从 1960 年塞浦路斯共和国诞生以来的历史。这也是一个变化快、变数多、变度大、变程难以预测的时期。

这个时期塞浦路斯内外交往的中心, 是建立一个统一的还是分裂的国家问题。塞浦路斯共和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殖民体系崩溃条件下建立起来的民族独立国家。它是亚非民族独立国家体系和

中东民族独立国家体系的一员。它也是在塞浦路斯国家观念和国籍认同尚未充分形成,和希腊族、土耳其族领导人争夺权力冲突的条件下建立的。殖民地时代的历史阴影遮蔽住他们的眼睛,使他们无视国家独立给他们带来的良好机遇,在权力讨价还价和互争互斗中蹉跎岁月。统一问题的解决,尚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实践体验和探索过程。

塞浦路斯作为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其独特性首先表现在一开始就强烈反映在外国的干预因素。英国保存着 99 平方英里的军事主权基地。希腊、土耳其不但有驻军权,而且两国都成为塞浦路斯的“保证国”。后来者美国以“调解人”的身份而进行干预。这些,都使塞浦路斯问题更为复杂化。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独特性,表现在希腊族和土耳其族领导人的“同国异梦”上。他们一开始都按旧思维、旧行动行事,特别是极端民族主义组织埃奥卡领导人,仍坚持与希腊合并运动,从而导致了流血冲突。尤其是希腊和土耳其两个“母国”对新兴的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军事干涉行动,结果出现了南北对峙的分裂局面,形成了旷日持久的谈判过程。和平进程总是因为错过了多次有利的历史机遇而延宕。直到 2004 年 2 月,仍然在不能谈拢的情况下,希腊族的塞浦路斯政府单独于 5 月加入了欧盟。塞浦路斯问题昭示着一个理念:愈是难以判断发展前途的事物,其中必然包含着历史活动的复杂性和深刻性,作为一个研究者的工作,不是为了寻找终极的结论,而是在疑问、困惑中拓展历史智慧。

最后,塞浦路斯问题的由来和发展,特别是民族和宗教之间的交往,在时间段上往往超出了一般人思维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漫长程度,从而持续活在一代人又一代人的心灵中。民族和宗教作为人类文明交往的主要因素,是历史上异乎寻常的创造物,它如此古老而年轻,又如此强大而持久,过程既曲折又复杂,或直接、或间接、或明显、或隐蔽地把过去、现在和未来联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

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光阴就是时间,在中东的百代过客中,哪一代过客能不带有民族和宗教的文化基因而在交往的时间段上匆匆走过,并且留下自己的文明创造踪迹呢?

三

海岛塞浦路斯文明画卷的每一历史时间,都处在一个空间之中,都有一个实在的空间背景和舞台。

如果我们从时间的文明交往论角度,转移到空

间的文明交往论角度,来观察塞浦路斯这个海岛舞台,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这样两个交往互连网络:人类的居住空间地域,限制和决定着居住群体的独特生活方式、价值取向、社会结构和社会心理;在所处境域的人们不是孤立于周边环境之外,而是同周围环境密切相关,尤其是在民族和宗教交往方面,自觉或不自觉地受着相近文明圈辐射和扩展带来的影响。

塞浦路斯具有独特的地域文明特点。它是地中海东部的“文明灯塔”。这个灯塔地处海域的地中海文明、北非文明和西亚文明的要冲,从它的近距离、中距离和远距离这三个空间段,照耀着东西方文明交往之路。

地理位置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坐标。民族和宗教无论大小,在地图上必定会显示出各种形态的坐标位置。正如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提出的“历史的地理基础”和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归结的“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和人周围的自然”概念一样,塞浦路斯文明交往的本质特征,首先取决于它所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和局限性。它的面积有 9 251 平方公里,是地中海中仅次于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第三大岛。它远离地中海文明中心,又近靠西亚、北非文明边缘。前者因希腊移民潮的涌入,从而使希腊族得以较早形成为主体民族,弥补了塞浦路斯与西方文明交往不够密切的缺陷;后者因长期与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埃及交往密切,特别是北邻的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长期对塞浦路斯的统治,在人口构成和文化内容上注入土耳其族和伊斯兰教因素。这两个毗连接触面的地缘特征,制约着塞浦路斯的民族和宗教之间交往关系的独特性。

塞浦路斯这种两个不同民族和不同宗教的文明,同地中海总的文明比较起来,处于一种矛盾状态:它的地理位置对地中海极为重要,但总是受制于亚、非、欧强势文明的影响;它既先进,又落后;它既有对地中海扩张运动的开放敏感,又有对北邻土耳其伊斯兰教文明冲击的威胁感,还有两种对立文明内部社会活动的孤立闭塞状态;它在发展上常处于保守与革新、分散与集中、狭隘与极端的两极对立与分化进程之中。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以后,围绕希腊和土耳其两个主体民族政治平等、分裂与统一、建立世俗联邦国家等问题的酝酿,已走过漫长的过程,今后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对于塞浦路斯问题的谈判,悲观预测往往总是正确的。内部的近距离的民族与宗教之间的交往,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利益

的时候,塞浦路斯问题解决的步履总是显得那样的蹒跚而踟蹰。

如果说,塞浦路斯近距离交往陷于长期内争、内耗的艰难处境,那么,它同地中海中心沿岸地带的中距离交往,却显示出了在空间的优越性。这座“东地中海的灯塔”,在历史上曾辉照四方:西方从360公里外罗德岛直到希腊文明的本土;北方从80公里的安纳托利亚海岸直到伊斯兰文明圈的土耳其本土;东方从90公里外的叙利亚海岸直到新月带和阿拉伯半岛的西亚远古文明圈以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圈的中心;南方从439公里外的苏伊士运河直到北非远古文明圈和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大国埃及。据说,塞浦路斯的最早记载,见于公元前1450年的埃及文献。塞浦路斯是连接意大利向地中海航路与土耳其和叙利亚的陆上丝绸之路的衔接点。这种地理大环境也有其不利之处,即历代大国为争夺商贸和军事重地竞相角逐,后来的大国干预,都给当代的塞浦路斯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不结盟地位留下诸多难题。塞浦路斯在远距离交往中,因在空间上处于世界历史进程走廊的中继站位置,因而扮演了东西方文明交往前台的角色:多少个民族往这里迁徙,多少个帝国在这里征战,多少个宗教在这里传播。塞浦路斯人注意的是它与历史上“蔗糖之路”的关系。蔗糖起源于印度,是由阿拉伯人在7世纪或11世纪传入塞浦路斯。虽然在传入时间上有争议,但由阿拉伯人传入和起源于印度这两点上,似乎具有共识。例如英语的糖(sugar)、阿拉伯语的糖(sukkar)、波斯语的糖(shakar),均来自梵语的糖(cakaka),经中外许多学者考证,已成定论。这里要提出的是,塞浦路斯作为海洋航线上的岛屿,参与重大的国际交往,像许多岛屿的命运一样,常常是经济上单一作物的受害者。外来作物传入岛屿,只是为了在地中海或者世界市场上销售,而受惠者却是外国贵族或商人。塞浦路斯和大西洋许多岛屿如马德拉岛(糖岛)、加那利群岛、圣多美岛一样,因单一的甘蔗种植失去农作物的平衡。塞浦路斯蔗糖生产的兴盛,与十字军东侵这一文明交往有关。西方人通过鲁西格南(Lusignan)王朝(1192-1489年)的统治时期,逐渐使蔗糖成为塞浦路斯商业贸易重要商品。除了糖之外,蚕丝也由塞浦路斯这个“中继站”而转向西方。

在远距离的文明交往过程中,有两点值得注意的事件。第一是十字军东侵,这是西方控制地中海、把势力扩张到地中海东岸,而且开辟了与东方长时

间、大规模交往的战争形式。在第三次十字军东侵时,一些十字军人、西方商人和僧侣,便移居塞浦路斯。这次东侵的直接政治结果,是法兰克鲁西格南王朝从圣殿骑士团手中取得了塞浦路斯的统治权。鲁西格南王朝300多年的统治,形成了多重矛盾的交往局面:灿烂的文化、对农民的压榨和塞浦路斯正教会受西方主教的管辖。王朝有作为皇帝彼得一世成为许多背景迥异的作家立传的对象,这些作家包括《十日谈》的作者薄伽丘(1313-1375)和《神学大纲》的作者阿奎那(1225-1274)。第二是塞浦路斯与中华文明之间的交往。塞浦路斯的养蚕业的传播,肯定与丝绸之路这个远距离的文明交往有关,但具体路线尚需研究。另外,法国历史文献中,记载了塞浦路斯的鲁西格南王朝豪华宫廷在15世纪向西方传播中国唐朝服饰一事,也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这就是唐朝圆锥形女式高帽和尖长的翘头鞋经塞浦路斯西传问题。这既引起了西方学者对塞浦路斯参与国际交往而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活动感到惊叹,又使他们为其传入法国和查理六世宫廷之慢,胜过某些星球的光传到地球而感到惊讶;还使他们从塞浦路斯国王那里接受这笔遥远的遗产而兴奋。

远距离的文明交往过程是复杂的,中距离的文明交往是多样的,近距离的文明交往是多变的;同时,这三种空间的文明交往是相互交叉和互为补充的。文明的边界虽然可以用好多的文明圈、文明区和文明带来界定,但其边界必定因文明交往中的引进和输出而变化。在16世纪以前,人类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所带来的相互影响,是缓慢的、一点一滴来临的。旅途的遥远、行程的曲折和交通的不发达的限制,文明交往对塞浦路斯发挥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但是,无论如何,塞浦路斯的内部文明特征已经基本上形成了。

四

时间、空间、人间,这是文明交往的三个重要条件。时间即机缘,空间即地缘,而机缘,地缘,都是为人所用。人是主体条件。历史时间是人化的时间,历史空间是人化的空间。离开了人,离开了人的主体性活动,就无法认识时间和空间。“人以群分”,人类最基本、最稳定的划分是民族。民族是人类群体演变至今最高级的群体形式,而民族又能够以共同体的范畴,同宗教相结合、相重叠、相联系在一起。民族和宗教之间的交往,是人际间交往见之于族群与信仰人群之间的一个重要方面。所谓民族冲突和

宗教争端,就是人类在一定时间、空间环境中,进行交往活动的一种表现。

人们创造历史的交往活动,首先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进行的。塞浦路斯与中东许多国家不同,它之所以在空间上重要,不是石油,而是它地缘政治中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海上战略地位。“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天地就是大自然赋予的空间,人类在时间上世代更替于这座历史舞台,经历着民族之间、宗教之间的频繁、复杂而多变的交往。它不仅仅是冲突和争端,也有和睦相处和合作的交融。下面我把一位英国作家和艺术史学家的塞浦路斯之旅的游记要点,摘录于后,以窥见人间的民族和宗教在这里的某些具体历史联系。

这位作家就是罗伯特·拜伦(Robert Byron, 1905-1945)。他是英国诗人乔治·拜伦(George Byron, 1788-1824)的后辈远亲。他有两本游记:《先到俄罗斯,再到西藏》(First Russia, then Tibet, 1933)和《穿行内陆亚洲》(The Road to Oxiana, 1937)。Oxiana,即乌浒河流域,今中亚的阿姆河流域或平原。《穿行内陆亚洲》这本书2003年10月广西师范大学出了中译本。

1933年8月29日,罗伯特·拜伦到达塞浦路斯时,以深厚的历史感书写了这本游记的开篇语:“这座岛屿的历史实在太丰富了,丰富到给人以某种心理上的负担。”历史感赋予了他的历史观念,历史观念既赋予他以绵延的表层外在图景,又赋予他以深远的潜层内在心态。以下便是他实际观感的要点:

1. 他是从宗教这个人类文明交往的重要内容来叙述塞浦路斯丰富历史带给他的心理负担的:“公元45年,塞浦路斯岛萨拉米斯(Salamis)地方人士巴纳巴斯(Barnabas)与使徒保罗(Bul)共同促使该岛居民皈依基督教。”他写道,《新约·圣经》人物拉撒路斯(Lazarus),即耶稣曾使他死里复活(《约翰福音》第11、12章),据说即长眠于此。肯恩主教的两个侄儿伊恩(死于1693年)和威廉(死于1707年)都葬于此。他对基督教文明越过自己的文化边界而进入塞浦路斯的最初交往的记载,对于这个地区日后的影响与作用,是意味深长的。不仅如此,他还见到了东方教会的亚述人领袖马席孟(Mar Shimun)。此人因英国政府背弃诺言,不允许亚述人建国,1933年被伊拉克政府流放于塞浦路斯,并关进监狱。罗伯特·拜伦叹息地写道:“这是英国外交背叛史上又一案例,它有终结的一天吗?”在这里,他清楚表明了对英国政府殖民统治者的不平等、不公正和不择手段

的交往的不满。

2. 可贵的是,他不仅对英国的外交政策表示不满,还如实地记载了塞浦路斯在民族和宗教交往史上所形成的政治文化特征:法马古斯塔(Famagusta)为土耳其族人居住,瓦罗沙(Varosha)为希腊族人居住,“中间连接着英国人居住的郊区,那里有政府的办公室,英国俱乐部。”同时,他讽刺地写道:“如果塞浦路斯属于法国人或意大利人,那么今天造访法马古斯塔的观光船只,就会像罗得岛那样络绎不绝。在英国统治之下,那种刻意的腓力斯人作风令人裹足不前。”腓力斯人(Philistia)是《圣经》中提到的巴勒斯坦古国居民,他在这里引申为“平庸的、没有教养的”等贬义词,用来讽刺英国殖民统治者的无能。

3. 在尼科西亚,他特别记述了塞浦路斯希腊族人1931年争取与希腊合并起义。这是一次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起义事件,起义者摧毁了政府大楼,但遗址仍然存在。虽然大楼已为新的政府大厦所代替,但大厦外陈放着1527年英王亨利八世给耶路撒冷圣约翰修会的赠品——一门加农炮,炮上镌刻着都铎王朝的纹徽。他诧异地回顾过去一段民族与宗教交往:“但是,1928年为纪念英国统治50周年时所铸造的纪念钱币上,采用的却是狮心王理查的徽饰,他于1191年征服此岛,并在此完婚。”这里说的是第三次十字军东侵时,英王理查1192年在塞浦路斯与王后贝伦加里娅举行婚礼的事件。

4. 作为一个艺术史学家,他特别注意到了塞浦路斯东郊小镇基提(Kiti)教堂内美不胜收的镶嵌画:“圣玛利亚的袍子是深紫色的,几近于木炭的色泽。她旁边的天使则穿着白、灰及黄色打褶衣衫;她们的绚丽翅膀呼应着手中所拿的绿球。脸部及手脚所使用的嵌块比其他部位小。整体的构画极富韵律。由于人物的尺寸不会超过真人大小,加上教堂又相当低矮,因此可以凑近到只隔10英尺的距离细细欣赏屋顶的这幅杰作。”据介绍,这是6世纪拜占廷时代的作品。这是当时修道院相对安静生活和文化水平普遍提高的修士修女从事宗教艺术活动的遗存,也是正教会所处的多种文明交往地区特征的表现。不过,罗伯特·拜伦从技巧手法上断定,它应属于10世纪的作品。

5. 罗伯特·拜伦没有忘记对塞浦路斯空间地缘特产的考察,他细心地注意到了当地的农业状况,如葡萄园、山羊、麻黄、丝柏、风车、蜡蜡花和正在采集、供牛饲料的角豆。这个考察使我想起1850年鲁西格南王朝的后裔——埃斯安讷神甫在一本有关塞浦

路斯“奇花”“异草”书中的记载。这位神甫说,当时的牲畜饲料是用棉籽和切细的棉杆混合在一起搅拌而成的。他在书中还提到,有一种酷似石榴树、开着像成串葡萄花的“塞浦路斯树”,其叶子煎水可作成橘黄色染料,通常是被贵族们用来染马尾巴。但罗伯特·拜伦没有谈到这些,也许这两种植物在 20 世纪 30 年代已不复存在了。

6. 罗伯特·拜伦还记述了城堡外一群囚犯挖地和下海午浴的场面。岛上负责保管文物的老人杰弗里给他拿出一张 13 世纪当地地基的平面地图,并且告诉他,这些地基开始于鲁西格南王朝时代,是当时囚犯们强迫劳役的地方。他登上沿岸山上的圣希拉利恩堡(St. Hilarion's Castle),发现“在 60 英里外的碧蓝大海的另一边,隐约可见到小亚细亚托罗斯山脉(Taurus Mountains)的轮廓。”那里曾经是统治过塞浦路斯的奥斯曼帝国,而此时是凯末尔革命后的土耳其共和国。

罗伯特·拜伦是走出西方文化边界而步入东西方文明交往的汇聚地——塞浦路斯的旅行者。苏轼的“快意雄风海上来”的诗句,也许能折射出他的地中海和中东文明之旅的交往视野。他的旅行游记是一本打开了塞浦路斯不同民族和宗教之间的文明交往之书。文明交往对于知识贫困者、对于闭目塞听者、对孤立于外界者,无异是一本合着的书。只有知

识富裕者、视野开放者、广为交往者,才能开启和解读文明交往的奥秘。塞浦路斯的历史长度是无限的,它的空间是有限的,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却重复着一种崇高的、艰难的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就是希望之所在。

塞浦路斯的事例,表明了民族和宗教问题在文明交往史上的至关重要性。任何文明都是在文明之间和相同文明之内交往中延续,在不同时间、空间及人间的社会、政治、经济、商贸、文化、技术诸多领域的交往中得以丰富和发展。民族和宗教是文明内的重要文化基因,它和外在文化激励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文明交往的活力源泉。历史上一切变动,无论是政治、民族、宗教,无论是经济、生产、社会,都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交往的或明显或不明显的表现。历史归根结底是文明和文明交往的历史。历史学家对斯宾格勒、汤因比、亨廷顿的文明理论持有疑议,不是没有根据的。研究者不能总是翱翔于宏观的“高明之见”的天空上下不来,也不能总是沉湎于微观的“考索之功”的低层次上不去,更不能囿于政治偏见而陷于思维上的片面性。文明和文明交往理论,必须建立在对众多历史个案的总体思考和对现状事件的阐明与客观实践检验的厚实基础之上,才能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

[责任编辑 刘欢]

On th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Religions in the Middle East

—The Afterward of the Book *The General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Cyprus*

PENG Shur zhi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69,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issues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nationalities and religions in the Middle East from the angle of the theory of the communication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the Greek and Turkish races lack the sense of nation in the light of the basic conditions of such three civilization communications as time, space and human coexistence. The paper also points out that the Greek race mostly belongs to the scope of Europe, while Turkish race mostly to Turkey. It is these factors that make it more difficult for these two civilizations merge with each other. These factors become the inner cause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races and religions in modern Cyprus.

Key words: Cyprus; Greece; Turkey